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

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多元之美

Esthétique du Divers

乐黛云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

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多元之美

Esthétique du Divers

乐黛云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之美/乐黛云,孟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301-15256-0

I. 多… II. ①乐… ②孟… III. 比较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1147 号

书 名: 多元之美

著作责任者: 乐黛云 孟 华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256-0/I · 211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344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多元之美》论文集小序

乐黛云 孟 华

21 世纪就这样来到了人间,人们都在思考未来。我们终于在人类公元第三个千年的第一个春天在古老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丽的北京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

这次国际会议可以说已经筹备了五年!

1995 年金秋,我们满怀信心,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以“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接待了第 14 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全体理事。他们来自 26 个国家,共 32 位,加上到会的中国学者,那次国际会议共有百余人参加。会议开得十分成功,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组织水平都给初次到访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们十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北京古城深厚的文化魅力,许多理事,包括当时的主席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和几位副主席都认为新世纪第一次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必将在北京召开无疑!三年一次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一般都是 600 至 800 人的规模。我们曾竭尽全力为迎接这次大会的召开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 1997 年,在荷兰召开的 20 世纪最后一次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600 余人投票,我们竟以 30 票之差,莫名其妙地输给了比较文学才刚刚起步的南非!

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决定仍然要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在北京召开一次高水平的国际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以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因为,我们坚信 21 世纪将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世纪,一个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纪!一个比较文学在人类心灵沟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纪!

这次意想中的大会终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这就是 2001 年 4 月 8 日至 10 日以“多元之美”为题的盛大学术会议。“多元之美”化用了法国作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一部美学论著的书名《论异国情调——多样性美学》。“多样性美学”原意为承认美在于差异,只有在差异感中才能产生美感。这是谢阁兰针对 20 世纪已初露端倪的全球标准化和无差异趋势而提出的,它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无疑具有更紧迫的现实意义。我们化用此词为会议主题,既是对谢阁兰思想的一种张扬,也是为了赋予其一层中国人独特的解读:“多元之美”一方面指“美”的理论之“多元”,另一方面也指生活和艺术中不同的“美”的显示与聚合。

2 多元之美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翁伯特·艾柯(Umberto Eco)最近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能生物,同则不继”颇有相通之处。“和”就是和谐沟通,使各种差异得以繁荣共生。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在这次大会的发言中对此十分肯定。他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

本次会议以文本研究为主体,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即:多元文化发展中的翻译与接受;不同诗学体系的对话与沟通;多元文化中的形象与神话研究;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东亚文学;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应该说,每一方面都有新的收获。当然,不可能,也不期望做出面面俱到的结论,但总是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或是对过去反复讨论过的问题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充分显示在这里选登的各篇论文之中。

参与这次大会的各个方面都肯定了大会的成功。我们谨对积极参加这次大会并作出贡献的国内外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对为组织这次大会不辞辛劳的同学们表示衷心感谢!总而言之,我们在文学领域内共同完成了一次体现和促进文化多元化的创举,我们无愧于成为既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又抵制文化孤立主义的新世纪新文化的早春第一燕。

北京大学“多元之美”国际比较文学大会 开幕式致辞

毛 磊(Pierre Morel)
(法国驻华大使)

尊敬的两位主席乐黛云和孟华女士,各位主席先生,各位教授,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高兴和你们一起为这个重要的研讨会开幕,躬逢八方英华星聚之盛。我不想对大家隐瞒自己对这个主题怀着浓厚的兴趣。除了向所有组织者表示热烈祝贺,并衷心祝愿各位工作成功之外,我还难以抵挡一种诱惑,希望和大家谈谈在华数年期间滋养起来的一些个人心得。

—

这个学术大会很重要,主题也非常现实。我和北京大学这个出色的筹备组的几位成员有过数次会面,由此知道筹备工作的精心尽虑。

其实,我们能够分享彼此的思考是理所当然的。外交官和比较学者们都不难对你们即将探讨的主题各抒己见。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实践者。

我们还衡量着所谓的全球化产生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其后果乃是众说纷纭的主题,并引起几近普遍的激烈抗议;然而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活跃的思考,越来越集中的讨论,尤其是纯文化领域内对该现象的探讨。因而,法国近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推出“文化特例”(l'exception culturelle)的概念,就是要强调自由贸易规则并不能以统一的方式运用于文化财富之上,因为后者无法降格为简单商品。这种立场的优点在于能够引发争论;但它显得偏于防守,封闭于一套特殊的逻辑之内,游离于身份边缘。因此,我们深深感觉到自己置身于现代性之争的中心,这一争论席卷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文明的胜负手。辩论刚刚开始,思考正在发展。经过这最初的阶段,我们的概念将被拓宽,更加具有活力,最终将大大提高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积极立场得到了广泛响应,尤其

是在中国。

二

为了贴近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不妨回忆起标题的始作俑者,我是说维克多·谢阁兰。作为医生、诗人和考古学家,一个世纪以前他曾几度居停中国,在此写出他的精华之作。其作品曾长期默默无闻,只为行家所知,但是如今谢阁兰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露,你们的选择本身就是证明。

为什么谢阁兰的影响会不断增强呢?首先是因为,自从第一次中国之行起,谢阁兰就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决心走出19世纪末法国文艺生活中盛行的“异国情调”。谢阁兰不是在寻求新的猎奇体例,或是灵感的新主题。他明白中国是一个他者世界,其带来的深远震撼足以启发行动,甚至创造。

谢阁兰的原创性还在于,他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其所有作品都交叉跨越了诸多领域。他对文学的构想——更准确地说是对诗歌的构想——要求很高,并深受兰波(Rimbaud)和克罗代尔(Paul Claudel)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渊远的历史同样感兴趣,并全身心投入到方兴未艾的法国汉学之中——该学科基本的科学态度由沙畹(Edouard Chavannes)定型,并迅速涉足于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三个领域。我们也别忘记谢阁兰与德彪西(Debussy)交契,他后来给这位作曲家朋友创作了一部歌剧脚本,变革了当时欧洲的音乐品味。也别忘记在前往中国途中,年轻的海军医生维克多·谢阁兰途经法属波利尼西亚,适逢他所钦慕的保罗·高更(Paul Gauguin)逝世不久。以此为契机,他创作了一部伟大的神话小说:《远古者》(*Les immémoriaux*),它堪称高更的巨作塔西提绘画之文学版。

更广义上讲,谢阁兰经历了西方意识超越东方主义范围的深刻变化。东方不再是浪漫主义者为一个迥异的他者世界而勾画的迷人幻象。这种变化标志着西方意识危机的新阶段。1860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就谈到代表着“高尚品位”的世界两极:希腊和中国。兰波放弃诗歌以后,首先去了印度尼西亚,然后去了红海和哈勒尔。兰波标志着法国诗歌的一道裂痕,其意义堪比尼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人们不难在其作品中感受到这一点。请允许我在此打断一下。

通过与中国学者的多次接触,我注意到在世纪之交有三位诗人深受中国影响:保罗·克罗代尔对这个国家着迷,但不曾有过真正的了解;相反,谢阁兰完全投入其中,以至于迷失,或者几乎迷失了自我;最后是圣·琼·佩斯(Saint John Perse),他在《阿那巴斯》(*Anabase*)中找到了通向广阔空间的诗歌的起点。此后,另一个更年轻的诗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继续用诗歌展现出对中国的惊人兴趣。他在一部早期作品《一个在亚洲的野蛮人》(*Un barbare en Asie*)中记录自己在旅行尽

头产生的真实转变。在这些诗人里,谢阁兰最好地把握了中国典型的相异性。对他而言,这是世界上最完整的“非欧洲”体系,因此,他称其为“最有对立性的材料”。通过自己作为医生、诗人、考古学者和旅行者的种种经历,他证实了中国具有更加古老的历史,这是为他开启超越时间之门的不可撼动的基石。

但是,最重要的或许是他其中感受到的喜悦与痛苦的杂糅。事实上,他同时发现了他者的**极端性**和业已降临的**危机**。在这种致命的对立中,他认为发现中国事实上也就是发现中国的衰落。没有必要一遍遍地重复他的焦虑:“多元性在减少,这是世间最大的危险。所以必须和这种衰退斗争,搏斗,或许和美丽一起死去。”在谢阁兰作品的深处,隐藏着这种世界奇观将逝的强烈意识。一个世纪以后,令人难以置辩的是这种状况甚至变得更加醒目。

因此,谢阁兰意识到一次历史巨变的起点。他是先觉者之一,预感到甚至就在殖民帝国扩张到极盛之时,西方的衰落便已开始,这无疑是因为他与这种征服者的意识形态之间始终保持距离。他的宣言来自另一层面,无关于权力的梦想抑或对静止世界的思旧情怀。谢阁兰的视角与众不同,但他在太过短暂的一生中没能或没想要进行解释。他将自己所追寻的神话目标称为“精神的西藏”,它超越了知觉的极限。他努力在“两个坡面”上生活和写作:法国和中国;文学和考古;美学和哲学。他在作品中寻找避免衰退的方法,以求保存“他者”(l'autre),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异者”(l'exote),以及为他开启充分驰骋天地的另一个自我。

三

在尝试着追述这位启发本次研讨会主题的作家之心路历程后,自然还必须思考今天如何构思、建设和组织这种“多元之美”。

首先,我想说我们不必刻意寻找,因为我们就置身于多元之美当中。证据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有时候表现得有些漫画式的讽刺。我们当然不缺乏确定的方法,它们始于文学研究,本次大会就可以作为代表。在未来的岁月里,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材料、工具方法和讨论内容都将备受推崇:翻译与出版、作品的接受研究、对神话的统计和分析、形象学等等。但是,在全世界参考书的大量涌现之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一种加速度正在产生: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看到全球化首先表现为一种平庸化,一种各文化的统一化。而与之伴随的是世界各地,“地方特性”引人注目地甚至有些野蛮地又重新抬头。有些人从中得出相对主义的教训,将各种文化现象等价起来;另一些人反道而行,宣布宗派主义甚而蒙昧主义的复苏;还有一些人声称对抗普遍存在,并冠以“文明的冲突”这种简单化的、因而危险的名目。

这种相遇引起的讨论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会帮助我们摆脱遍布全球的一种迷

茫情绪。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可避免,而相互了解的必要性也因此日益凸显。我们各尽其职,都应该为文化间实现真正的对话而贡献一份力量,以求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即相异性的和谐。

但是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之内;由于经济领域内一些现象在平行地而且强有力地发展着,它变得日益丰富和复杂。意识形态的碰撞乃是20世纪的标志,它使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得以确定其秩序,当然,这种秩序不乏漫画式的夸张和约简,但还是作为一个方便的事实而被确定下来,人们最终甚至会把它当成事物本身的秩序。如今,强大的交流整合运动已经在全球确立,与之伴随的是经济的相互开放,然而同时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日益变得“商品化”。一幅新的漫画,新的约简。

经济主义胜利了,各地不时爆发的抗议恰恰证明了它的凯歌前进,这似乎已经不可阻挡。这一潮流的力量在通讯网络的迅速发展中进一步增强,其好处显而易见,因此人们也情愿忽略它在谢阁兰所说的“衰退”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了。人们对通信艺术的死亡倍感惋惜,但是,人们更高兴能在一瞬间遍访世界各地的朋友。

这种变革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已经受到了激烈的指责:野蛮的多极化,灾难性的世界一体,还有商业规则对这颗星球上一切生活方式的普遍统治。

为了不夸大事实,最好重提一遍谢阁兰建设性的直觉:被完全接受的差异能够产生创造性的张力。必须坚持不可约简性,以反对所有形式的衰退和平庸化。重返本源是永恒的要求,只有它能带来发现和再发现,带来新的交流经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各自的方式重新了解多元化,把握衡量真正差别的尺度,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谢阁兰申明其信念的一个世纪之后,“多元之美”作为一种主动保持差别以求开辟新途径的美学得以确立。我们预感:必须毫不退缩毫无保留地让各原创性文化身份存活或者复活,以促使它们超越自身。

即便这种亲密显得有些唐突,但请允许我在最后说一句:50年以来这种方法就是欧洲建设的中心所在。它会引起一些混乱,但是不论对内,即在旧欧洲的国家之间,还是对外面对其他文明,它都是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我很清楚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但在此我要强调在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法国有雄心要在欧亚之间建立更加广泛的亲密关系,让双方都更好地向世界的多元性敞开。那样,也只有那样,才可能重建真正的世界主义。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朱晓洁/译 杨治宜/校)

目 录

《多元之美》论文集小序	乐黛云 孟 华(1)
北京大学“多元之美”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开幕式致辞	毛 磊(3)

一、不同诗学体系的对话与沟通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乐黛云(3)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以“引经据典”为中心	陈平原(8)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互文性	
——从《易经》到《文心雕龙》	张汉良(21)
异域情调之美	张隆溪(29)
从差异之美到认知危机	
——试析谢阁兰的《论异国情调》	秦海鹰(36)
西方的爱情与东方的友情	
——阿瑟·韦利和夏目漱石眼中的诗歌题材倾向	平川佑弘(45)
如何赏读一首中国古诗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我认同观	郁 白(Nicholas Chapuis)(53)
比较诗学:谁是“第三者”?	徐新建(59)
论惠特尼《图诗选》	
——一个多元读者的考察	周树华(69)

二、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东亚文学:多元与对话

日本“古物语”《竹取物语》生成的考察	严绍璁(85)
挂词、对与隐喻:双关语的比较诗学	川本皓嗣(108)
围绕名作和巨匠认知问题的认识上的龃龉	
——以“日本美术史”形成期(1870—1900)为中心	稻贺繁美(114)

三、多元文化中的形象研究

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间性:

- 从形象学到媒介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127)
- 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化了的西方人形象
- “洋鬼子”浅析 孟 华(134)
- 文学形象学、第三世界与后殖民批评
- 穿行在西方与中国之间 让-马克·莫哈(Jean-Marc Moura)(151)
- 形象与反形象
- 透过冈仓天心和林语堂的英语
- 作品看日本和中国 米丽耶·德特利(Muriel Détrie)(168)

四、多元文化发展中的翻译与接受问题

- 翻译:传递还是变异 谢夫莱尔(Yves Chevrel)(181)
- 尊重、交流与沟通
-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 许 钧(189)
- 后殖民偏见或异国情调心理学
- 解构主义以来对中国的描述 欧阳楨(196)
- 华人法语创作:交叉形象与跨文化写作 张寅德(202)
- 范式的置换与意义生成 王晓路(214)

五、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

- 我们的认知方式:全球化
- 普世主义的终结 德里克(223)
- 理论与心智 刘 东(240)
- 玄学解释学 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249)
- 神学解释学的人文学价值 杨慧林(265)
- 超越宏大社会理论
- 比较史学及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 王国斌(280)
- 译名对照表 (292)
- 《多元之美》论文集选编后记 孟 华(297)

一、不同诗学体系的对话与沟通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乐黛云
(北京大学)

—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科技标准化、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否有可能得以幸存并得到发展？多元的文化生态是否可以得到保护和保存？在这样一个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所从事的文学研究或比较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能做出什么贡献？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正如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来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西周末年(约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

齐国的大臣晏婴(卒于公元前500年)进一步解释了伯阳父的思想。有一次他拜见齐侯时，齐侯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侯侍臣，姓梁，名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议论。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晏婴说，像梁丘据那样的人，你说对，他也说对，你说不对，他也说不对，有什么用呢？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因此，孔子(公元前551—前479)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

4 多元之美

但这里提出的“不同”，并不是互不相关，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必须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和”在中国是一个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和”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并非融合为一）。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强调的是“万邦”，而不是融为“一邦”）。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新书·道术》：“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

“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绝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在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作为儒家核心的道德伦常观念，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等双方面的行为规范，力图找到两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和适度。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礼”是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规范，它必须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在“适度”的基础上，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二

目前，尊重差别，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翁伯特·艾柯在 1999 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 900 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传统的逻辑学范式表现为主客二分、承认规律、本质和必然性；新起的现象学范式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强调主客合一，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和观察角度的变动而变动；最近盛行的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方式，则着重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例如法国的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教授认为西方人需要穿越中国才能更好地阅读希腊，“因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

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维（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认知方式本身发展的需要，重视“差异”、坚持“和而不同”原则都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主要障碍来自当前盛行的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第二种思潮属于后现代主义，包括文化孤立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

随着经济和科技一体化程度和传媒的普及程度在全球迅速增长，世界各地都很难避免每时每刻都受到某种强势文化的冲击。“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而膨胀起来。“普遍主义”认为，无论主观或客观，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遵守某种特定的、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社会、政治、文化范式。犹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代全人类立言”，将他们的道德信条强加于人，最后转变为道德暴政，以牺牲千百万人的意志和生命为代价，以贯彻他们自以为是的主观信念。新保守主义与此略有不同，他们强调千百年来，人类共同创造的美好事物和道德信念不会随历史的发展而被湮没，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重复显现，这就是理应被各时代、各民族所尊重的“普遍性”。从理论上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对，他们的问题在于认为这种脱离了具体时空的“普遍价值”与“德行”不仅亘万古而不变，甚且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极力崇拜抽象的同一性，而对历史和地域形成的特殊性一概加以贬斥，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崇尚的“普遍价值”又多半局限于西方的价值标准，很难将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念包容在内，当他们企图将一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而受到抵抗时，他们就会逐渐演变为新的雅各宾党，诉诸暴力，而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结果就是中国传统所摒弃的“以同裨同”。

作为“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普遍主义者指为“普遍”的东西多是独断的、僵化的，并有强加于人的暴力倾向；他们反对任何结构的制约，认为不存在中心，也没有所谓普遍性，只有互不关联的特殊性。他们特别强调的“无深度概念”消解了一切现象与本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与特殊、能指与所指（所谓能指的漂浮）之间的联系，使一切事物成为既无时间连续性，又无空间相关性的孤立个体，他们都只强调差别而忽视联系。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都是为保持既有差异而反对相互影响交流和压制更新的。其实，只承认“差别”远远不够，重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个体，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起来的，同时又保存着原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中国古训中的“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强调的就是各种因素虽各有不同,但绝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也就是如何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的对峙也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讨论的“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命题的现代表现。早在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就已经深入讨论过这个命题,并指出个别和一般不可分割;黑格尔更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证和发展。然而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两者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重新沟通和弥合这种断裂是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的重要环节。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与“普遍与特殊”的命题虽然并不相同,它所探讨的是各有特殊性的“不同”事物如何相依相存,协调并进而达到“和”的境界。但也许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有益于解决“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断裂。

三

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说从古至今,各种不同文化都在竭力探索这些有关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持续的交流互动,也许可以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在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发展文化多元化、保护文化生态等方面,文学艺术可以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欣赏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在被创造时,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筑起自身的文化壁垒,在被欣赏时,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而撤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要削弱以至消解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关键是普通人之间的宽容、沟通 and 理解。文学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较少功利打算,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中的共同话题总是十分丰富的,如关于“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人类末日”、“乌托邦现象”、“遁世思想”等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取舍与诠释。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就能得到我们